

摹廬叢著



關中秦漢陶錄

上冊

陳直撰輯

中華書局

摹廬叢著

閩中秦漢陶錄

上冊

陳直
撰輯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關中秦漢陶錄/陳直撰輯. —北京:中華書局,2006

(慕廬叢著)

ISBN 7-101-04793-9

I. 關… II. 陳… III. ①古代陶瓷-陝西省-秦漢時代-圖錄②陶文-彙編-陝西省-秦漢時代

IV. ①K876.32②K877.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90750 號

責任編輯:王 勛

慕廬叢著

關中秦漢陶錄

(全二冊)

陳直撰輯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65印張·13插頁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冊 定價:390.00元

ISBN 7-101-04793-9/K·2060

《摹廬叢著》整理說明

陳直先生（一九〇一——一九八〇），字進宦，又作進宜，江蘇鎮江人，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生前曾任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籌備組組長、陝西省社會科學會聯合會顧問、陝西省歷史學會顧問。

陳直先生出生於一個貧苦的書香人家，幾代精研經史訓詁之學，所以自小打下深厚的舊學功底。他一直以王國維先生的私淑弟子自居，自學成名。他把「二重證據法」引入秦漢史研究中，以文物資料證史，開闢出一條治學新途徑，成爲二十世紀中國秦漢史研究的一面旗幟。

先生著述等身，經他本人多次修訂補充，統編爲《摹廬叢著》，以紀念其早逝的母親。所收之書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至九十年代前半期止，大體都已出版問世，對秦漢史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今年正值陳直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鑒於原書出版比較散亂，且絕大多數作品今天已難以獲見，爲了紀念陳直先生，也爲了滿足學術研究需要，特以先生手定稿本爲準，局部作了一些調整和補充，現整套《叢著》包括以下十一種作品：

- 一、《史記新證》
- 二、《漢書新證》
- 三、《關中秦漢陶錄》
- 四、《居延漢簡研究》
- 五、《兩漢經濟史料論叢》
- 六、《文史考古論叢》
- 七、《讀子日札》

八、《讀金日札》

九、《三輔黃圖校證》

十、《弄瓦翁古籍箋證》

十一、《摹廬詩稿》

其調整部分是，將《文史考古論叢》中凡已見於他書的論文，一律刪去；而涉及古籍整理校訂的五篇論文抽出，另擬名為《弄瓦翁古籍箋證》，與《三輔黃圖校證》合併出版。補人的則是陳直先生的詩作，今以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摹廬詩稿》取代已出版的節本《摹廬詩約》，使讀者能較全面的了解陳先生的文學藝術才能，以及詩中所反映的治學特色和史學觀點。

本叢書的整理，除《讀子日札》、《讀金日札》和《摹廬詩稿》三種特請周曉陸先生整理外，其餘均由本人負責完成。

此番受陳直先生遺屬陳治成夫婦的委託，整理《摹廬叢著》，作為摹廬弟子責無旁貸。特別值得說明的是，該集的出版得到了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岩先生、副總編輯徐俊先生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古代文獻編輯室主任李解民先生和責任編輯王勛女士的熱忱幫助，我謹代表陳先生的遺屬、朋友和弟子致以最深切的謝意和敬意。

周天游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於西安

前言

先師陳直先生字進宦，又作進宜，號摹廬。清康熙初年，其先祖陳宏澤愛好京口山水之勝，於是定居於江蘇鎮江，所以陳先生一直把鎮江作為祖籍。然而在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太平軍與清軍激戰於丹徒（今江蘇鎮江）時，其祖父陳桂琛倉惶攜全家避難於江蘇東臺縣。初居富安場，再遷梁垛場，最後定居於縣城。因此，陳先生實際出生於東臺，直至抗戰爆發年屆不惑之前，他大多生活在那裏，他的學術事業的基礎也奠定在那裏。

陳氏初居鎮江時，家業尚屬小康，但經播遷，家產蕩然無存。桂琛先生擅長詞賦，兼通醫術，故而初以醫術餬口，繼以課徒養家。陳先生之父陳培壽雖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中過舉人，但並不熱衷於功名，仍與長兄陳祺壽一起設館授徒，過着十分清貧的生活。正因為家境困頓，陳先生十七歲時便出外謀生，做過學徒、家庭教師、縣志編輯、義學教員等。其間曾考取清華研究院，却因經費無着，不得不忍痛放棄這次求學良機。但是，一則由於陳先生繼承並發揚了王國維先生治學方法的精粹——「二重證據法」，二則由於此次考學際遇，所以儘管未得王國維先生的親授，陳先生却一直以其私淑弟子自居。

本來陳氏幾代人縣學，均囿於制藝帖括之學。自從陳桂琛從學於溧陽強汝珣之後，始以精研經史訓詁之學，得窺學術之門徑。其家學以古文字學為專精，兼及文史。陳培壽即著有《說文今義》、《六朝墓誌題跋》、《武梁祠畫像題字補考》、《楚辭大義述》等。其有關經史的考證之說，經陳直先生整理加工，編成《古籍述聞》一文，刊登於《文史》第三輯上，其深湛之功力，可見一斑。陳祺壽也著有《且樸齋書跋》、《且樸齋文鈔》、《且樸齋詩鈔》和《鹽鐵論校補》等書，時有真知灼見。陳先生自幼便與嫡兄陳邦福、從兄陳邦懷一起接受兩位老人的教誨，耳提面命之際，打下了古文字學的深厚功底。不過邦福、邦懷兩先生一生均致力於古文字學研究，陳先生則從十三歲起轉攻秦漢史，先點讀《史記》，繼而通讀《漢書》，以後每二年讀一遍《漢書》，謹守不輟。二十四歲時，便寫成《史漢問答》二卷。

陳氏三兄弟不僅留意於文獻，而且醉心於金石博物。「我年十四五，喜摹金石字。我家三兄弟，採摭有同嗜。各

各出所藏，一一相較次。」「乾嘉諸老輩，攻金石刻辭。吾家數昆季，亦頗斟酌之。言笑有所獲，傳觀樂不支。」「(二)正是當時情景的真實寫照。不僅如此，由於陳先生對金石、瓦當、璽印、貨泉之學有較深的造詣，便結識了鄒適廬、黃賓虹、徐積餘、周夢坡等時賢，深受器重，並結為忘年交，書信往還，過從甚密。上述經歷使陳先生在四十歲前便已陸續出版《漢晉木簡考略》、《漢封泥考略》、《列國印制》、《摹廬金石錄》等著作，並協助丁福保編輯了大型工具書《古錢大辭典》。當陳先生將有關考古資料及心得運用於秦漢史研究時，便大放異彩，別開一番天地。

陳先生的一生可謂歷盡坎坷。無論是在東臺自立謀生時期，還是抗戰初流落到關隴，後於西安任職銀行時期，都主要為生存奔忙，只能利用有限的業餘時間從事研究，其艱辛可想而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教育部長馬叙倫的推薦下，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先生慧眼識英，將陳先生延請到歷史系任教，於是他的卓而不群的才識方得以充分發揮。

陳直先生一生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漢書》研究。其「以本文為經，以出土古物材料證明為緯。使考古為歷史服務，即非為考古而考古，亦非單獨滯於文獻方面」。從而在別人耕耘過千百遍的「熟地」上開拓出新領域。第二，秦漢經濟史（主要是產業史）及相關人民史研究。其《兩漢經濟史料論叢》一書，粉碎了所謂秦漢的手工業幾乎無話可說，東漢尤其是一個空白點的斷言，以文物證史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第三，居延漢簡研究。其成果大器晚成，自成體系。第四，即瓦當及陶文研究。以上成就確立了陳先生在我國秦漢史界的標範地位。

還是在少年時代，陳先生便對瓦當及陶文懷有極濃厚的興趣。二十二歲時，他曾寫下一首題為《題黃龍元年上虞王元方兩磚拓本》的詩：

黃龍紀年古有二，不道孫吳磚益奇。乃知儒者工傅會，考證未技真堪悲。鄒子鄭重復鄭重，傳自山陰沈霞西。中更藏弄難悉數，曰何曰魏差吾知。浙中埏埴夥精品，浙中老輩尤可師。延津雙劍析復合，變化迴非人力為。王氏上虞本甲族，當從元城徙會稽。縱橫結體勢拏攫，矧乃兩磚同範治。仇亭老氏眈眈視，幾致一篇絕交詞。歲闌剪燭伸繭紙，可能作雨驚墨池。〔四〕

從中不難看出，陳先生誠心誠意向浙中前輩如鄒適廬等學習鑒別考證陶文的方法，並樹立擯除清儒研究中的陋習，努力爭取做出一番成績的雄心壯志。不過限於客觀條件，這一志向遲遲未能在東臺實現。

一九四〇年九月，當陳先生爲了躲避日寇，不任偽職，從江蘇，歷經香港、昆明、貴陽、成都，輾轉來到西安後，陝西豐富的秦漢瓦當、磚陶資源令他驚喜交加，如痴如醉。「長安樂訪古，瓦文日搜剔。」^{〔五〕}他除了踏勘名勝古迹，親自尋訪之外，主要結交了劉漢基、白祚、李寶山、楊實齋、蘇億年、孫桂山、李道生、趙榮祿等古董商，或節衣縮食向他們購取實物，或多方設法索要拓本。同時他又與流落在陝的學者或收藏家如沈兼士、沈次量、柯莘農、謝文清、劉軍山、賈芸孫等人互相觀摩藏品，交換或轉讓實物或拓本，並與遠在異鄉的陳邦福、陳邦懷、黃賓虹、王獻唐、丁希農等摯友互寄拓本，交流心得，切磋學術。日積月累，竟收集實物有二百餘件，拓本約五六百紙。其中著名的孤品和精品有漢「梁宮」瓦、漢「孝大」半瓦、漢「后寢」半瓦、漢「則寺初宮」瓦、漢「惠治靈保」殘瓦、漢「蕭將軍府」板瓦、漢「羽陽千歲」瓦、居攝二年陶瓶、漢「楊」字瓦、漢「車府」「鳩法」「犬前後足」「野鷄」「牝彘」「羊後肢」六瓦範、漢咸里高昌陶鼎、漢「巧二」五銖錢陶範等，爲陳先生全面系統研究秦漢瓦當及陶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難怪陳先生要「敢傲乾嘉老，眼福意氣揚」了。^{〔六〕}他也因此自號「弄瓦翁」。

陳先生的瓦當陶文研究主要可以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爲搜集整理瓦當磚陶資料階段。時間起於一九四〇年秋，止於一九五四年。其間陳先生完成了三部作品。

第一部作品《秦居瓦談》大約完成於一九四二年，並發表在《西北論衡》上。該文既初步評述了陳先生早期搜集到的瓦當陶文資料，作了精彩的考證，也簡述了瓦當研究的歷史淵源與時狀。一九四三年底王獻唐在致陳先生的信中，曾做出了「博瞻精審，佩絢曷已」^{〔七〕}的評價。惜刊物已難得一睹，所幸陳家尚存稿本。

《摹廬藏瓦》則撰成於一九四七年。當時陳先生鑒於「秦中人士尚目驗，不講著錄；江浙人士重考證，不作遠游，以至西京文字淹沒不彰」^{〔八〕}，於是取秦中及江浙人士之長，以補各自之短，從自己機緣巧合所得之物中，選取精拓八十四紙，涉及實物九十七件，各作題識，加以著錄和考辨。此後又分別於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三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三年共六次加以訂補。凡當年之誤說，必加是正；凡日後之新解，必加補錄。如「關」字瓦，陳先生得自洛陽估人尤達綸，爲河南靈寶古函谷關遺址出土之物。起初以其瓦背下端微隆起，與漢瓦製作有異之故，斷定爲秦瓦。但到了一九七三年，在經過大量的比較分析之後，最終確定爲漢瓦。於是集瓦之經過，年代之考

訂，價值之辨析，觀點之更新，一一明晰，通覽全書，於治學大有裨益。此書一直被陳先生珍藏於家中。一九九一年由筆者於《文博》第五期上作了介紹之後，才被學術界所知。然而此書是《關中秦漢陶錄》的重要鋪墊，而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三年的訂補又是《關中秦漢陶錄》的重要補充，其承上啓下的作用不容忽視。這就是本書之所以將其收入的主要原因。

一九五三年，中國科學院向全國徵集學術著作。這時已轉入西北大學並開始過上穩定的教學科研生活的陳先生，以極大的熱情寫作了《關中秦漢陶錄》和《關中秦漢陶錄補編》，原稿連同拓片及《雲紋瓦圖錄》一併裝冊送交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獲好評，並被該所完好珍藏至今。

本書分四大部分，其中陶器部分收錄器物一百二十六件，瓦當和瓦片部分收錄一百八十二件，磚文部分收錄六十四件，而陶錢範部分則收錄一百二十九件，共計五百零一件。近代以來，瓦當收錄最多的著作必推羅振玉的《秦漢瓦當文字》，計三百一十九品，是羅氏從他所藏的三千餘件拓片中精選出來的，但只有圖錄，幾乎沒有考證。就秦漢瓦當陶文收集範圍的廣度和考證的深度而言，仍是《關中秦漢陶錄》占優。《關中秦漢陶錄》是陳先生所藏瓦當和陶文資料精華的薈萃，也是研究秦漢瓦當陶文必不可少的基本資料。四十年來，本書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和引用。

第二階段為專題研究階段。從一九五四年起，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為止。此間陳先生先後發表論文近二十篇。現將有明確寫作年代的作品記錄於下：

一、《陶文系統舉例》（附圖片三十二張），一九五六年四月寫定，未刊，已佚。

二、《西漢陶範紀年著錄表》，初稿收入《關中秦漢陶錄》第四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寫定，正式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一九五七年創刊號上。後經修改分見於《摹廬叢著七種》、《文史考古論叢》兩書中。

三、《韓城漢扶荔宮遺址新出磚瓦考釋》，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寫定，載於《考古》一九六一年第三期。又見《文史考古論叢》。

四、《洛陽漢墓群陶器文字通釋》，一九六一年二月寫定，載於《考古》當年第十一期。亦見《文史考古論叢》。

五、《江蘇高郵邵家溝漢墓出土封泥、符牌、陶壺考略》，一九六一年三月寫定，未刊，已佚。

六、《呂不韋戈的「寺工」、洛陽刑徒墓磚「無任」兩名詞的釋義》，寫定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後易名《「寺工」、「無任」兩詞釋義》，載於《考古》一九六三年第二期。後收入《文史考古論叢》。

七、《秦漢咸里陶器通考》，一九六二年一月寫定，先節載於《西北大學二十五周年校慶學術論文集》中，後經改定全文收入《文史考古論叢》。

八、《東漢「吾陽成」墓磚釋義》，寫定於一九六二年八月，先載於《西北大學二十五周年校慶學術論文集》，後易名爲《北京懷柔城北東漢墓葬發現「吾陽成」磚文釋義》，收入《文史考古論叢》中。

九、《秦漢瓦當概述》，一九六二年寫定，載於《文物》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亦見《摹廬叢著七種》一書。

十、《廣州漢墓群西漢前期陶器文字匯考》，一九六三年七月寫定，載於《學術研究》（廣州）一九六四年第二期。後收入《文史考古論叢》，有所訂補。

十一、《記西安傳世兩漢名人遺物及海城于氏藏印》，寫定於一九六四年六月，見《文史考古論叢》。

十二、《漢初平四年王氏朱書陶瓶考釋》，一九六四年七月寫定，載於《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亦見《文史考古論叢》。

此外，如《漢張叔敬朱書陶瓶與張角黃巾教的關係》、《陶缸朱書題字》、《石刻磚文中發現的漢代經學問題》、《漢代羌族文化的發現》（以上均見《文史考古論叢》）等篇，寫定年代已無考。以上諸作大凡言簡意賅，信而有徵，觸類旁通，發神啓智，多有不易之論。

其中《西漢陶錢範紀年著錄表》是目前唯一一篇系統考證西漢陶錢範紀年的文章。此作源起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王獻唐自四川南溪李莊的來信，詢問陳先生「近年（陶錢範）出土者有之年號在宣帝以前者否」。當時陳先生限於資料不足，無法作答，但從此存記於心。經過十餘年的苦心搜羅研究，陳先生終於完成此作，並得出三點結論：一、西漢五銖錢範有紀年題字的皆在陶範，而銅範絕無一見。二、未曾發現武帝年號，最早的紀年是昭帝元鳳四年，最遲的爲成帝永始三年。哀、平二帝年號則未見。三、宣帝時鑄幣量最大，是當時農業、手工業、商業發達的反映，應引起研究漢代經濟史者注意。其鏗而不捨、嚴謹求實的學風至今仍被同行所稱道。

而《秦漢瓦當概述》一文，是陳先生一生秦漢瓦當研究工作的高度總結。該文既論及了秦漢瓦當研究的起源和

發展歷程，也指明了秦漢瓦當的特點和分類；既按宮殿、官署、祠墓、吉語、雜類等五個方面選取典型瓦當加以著錄和考釋，又辨析了不同類型的秦漢板瓦文字；既敲定了瓦當的定義、造瓦手法、斷代的五點要素、漢瓦的分期和出土地點，又說明了秦漢瓦當的書體和規格、瓦文的字數和語言特徵；既簡述了瓦範的規格和品種，以及瓦窰和造瓦官吏之情狀，又論列了有關秦漢瓦當著述、藏家、瓦價、拓墨及偽刻之概貌。其內容之廣泛，材料之豐富，辨析之細微，論述之精要，舉凡晚清以來之論著，難有其匹。故而一經問世，即為士林所推重，成為瓦當研究的圭臬之作。

從以上所述不難看出，陳直先生被推為中國現代系統整理與研究秦漢瓦當和陶文物第一人，當之無愧。從表面上看，秦漢瓦當與陶文資料既簡略，又零散，似無大用。從史料地位而言，也難望文獻、簡牘、碑刻之項背。但其獨特之價值，不容低估。

首先通過秦漢瓦當、陶文資料可以進一步了解秦漢宮苑陵寢的情況，以訂正史籍之誤傳，補充文獻之不足。比如《漢書·郊祀志》記載漢武帝時於甘泉建有益壽延壽觀，顏師古注以為是益壽、延壽兩觀之名。然而《史記》則作「益延壽觀」。孰是孰非，歷來都有爭論。宋黃伯思《東觀餘論》從當時陝西曾出土「益延壽」瓦當出發，以為觀名當作「益延壽」。但日人瀧川資言在《史記會注考證》中則以為瓦之真贋不可知，而漢之觀或一字名，或二字名，此獨二字名，益延同義，不應復出，則「益」字係衍文無疑，當從《藝文類聚》引《史記》作「延壽觀」。陳先生却根據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吳大澂《憲齋磚瓦錄》、羅振玉《秦漢瓦當文字》均著錄有「益延壽」瓦，他本人於一九四八年春獲見一同類殘瓦，又見過一面「益延壽宮」瓦和一块「益延壽」天方磚，因此斷定《史記》原文最正確，《漢書》則衍「壽」字，其誤衍自唐時已然，了結了這段懸案。又比如漢代宮殿本甚壯麗，經過了近二百年，至西漢晚期已漸呈頹敗。陳先生從漢代著有紀年的瓦片土考訂分析，認為西漢末曾大加修理過六次：一在成帝元延二年，二在哀帝建平三年，三在平帝元始五年，四在漢孺子嬰居攝二年，五在王莽始建國四年，六在王莽天鳳四年。這一研究成果，為漢代建築史增添了一份珍貴的資料。

其次秦漢瓦當陶文資料可以運用於典制研究。比如西漢官營製陶業由何種官署來掌管，表志均無明文。陳先生根據出土的瓦文資料論定西漢主要是由宗正的屬官都司空來主持，另外少府屬官左、右司空協辦，王莽時改都司空為保城都司空。現存漢代宮殿或官署遺址中所出的磚瓦，均係官造。又比如陳先生搜集到大量的漢咸里私人作坊陶器，這批陶文中可分咸陽縣名類（包括咸陽亭）、咸里里名類和咸亭兼里名類等三大類。漢承秦制，縣下有

鄉，鄉下有亭，亭下有里，這在《漢書》以及《漢舊儀》、《漢官儀》裏本有明確記載。然而《漢書》本傳在記述戶籍時，常常只寫縣名與里名，如高祖爲沛豐邑中陽里人，路溫舒爲鉅鹿東里人；又六朝墓誌也常常寫縣鄉里名，不寫亭名。於是有人就提出亭在西漢縣制組織中，不屬於鄉，是爲另一行政系統。但是咸亭兼稱里名的衆多陶器證明，它們本屬同一行政系統無疑，文獻記載不記亭名，實爲刪繁就簡之意。

再次研究漢代經濟史特別是產業史，更離不開瓦當陶文資料。如前所述，西漢陶錢範對於研究西漢鑄幣史和昭宣中興史具有重要意義。而都司空瓦和咸陽咸里諸陶器對於探索漢代官私製陶業也擁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此外，如漢元和年間《公羊傳》草隸磚經的出土，證明漢代時經傳早已相聯。清儒所謂《春秋》三傳，漢以前皆經與傳離，漢以後始經與傳合。《左氏》經傳相聯始於晉杜預，《公羊》則始於東漢以後，《谷梁》則始於晉范寧的說法，不攻自破。又如漢咸里諸器中刻有安、巨、屈、彰、蒲、高、郟、沙、周、相、旨、白、商、暗、桓、于、中、牛、平等十九個陶工的姓氏，對於研究姓名學以及漢初宗族遷徙的情況不無裨益。再如「延年」、「益壽」、「長樂」、「未央」等吉語對於了解漢前期的時尚，「吾陽成」磚文對於了解東漢賄選的弊端，「常安鹿氏」瓦和「常生無極」瓦對於了解王莽改「長」爲「常」等避諱問題，「日利」、「日人千萬」等撲滿對於了解漢代民間儲蓄情況都會有特殊的收穫。所以無論是建築史還是藝術史，無論是經濟史還是文化史，無論是社會史還是風俗史，研究者均可從陶文中吸取有益的營養，揭示塵封的歷史本貌。

總而言之，僅據局部而論，瓦當磚陶確無大用，但只要將其與文獻資料及其他考古資料交相印證，綜合分析，却每每能起到畫龍點睛，一錘定音的作用。古人言道在瓦甓，豈虛語哉！陳先生在這方面爲我們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

當然《關中秦漢陶錄》及《補編》也存在一些弱點和不足。第一，成書較早，許多解放以後出土的瓦當及陶文資料未能補入，還有待於像陝西歷史博物館所編《秦漢瓦當》那樣的著作來彌補。第二，所錄瓦當和磚陶缺乏科學的發掘記錄爲依據，以經驗推斷或聽信估人妄言，總不免有膺品混入或出現誤斷。第三，著錄以漢品居多，秦品則甚微，而如袁仲一《秦代陶文》那樣的論著方可緩解本書的缺憾。

本次影印內容包括以下三部分：

《關中秦漢陶錄》及《補編》，共收錄器物五百零一品。

《雲紋瓦圖錄》，共收器物五十五品。

以上兩者拓片均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摹廬藏瓦》（附陳直先生其他藏瓦），其中《摹廬藏瓦》收錄器物九十七品，陳直先生其他藏瓦共選十四件，這一部分內容係陳直先生家藏。

本書一九九四年曾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依原大原色精印綫裝出版，反響極佳，惜印數甚罕，已成珍藏品。當年李學勤先生曾建議出簡裝縮印本，以應學人之需，惜因故未果。今中華書局受陳先生遺屬陳治成夫婦委託，出版本書，實為功德之舉。此次出版採用十六開，凡縮放了圖版下均加標比例尺以便讀者使用。

最後還應感謝夏鼐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的朋友們，沒有他們當初的慨然應允、精心保護和無私幫助，本書的出版也是不可能的。我相信所有從本書中獲益的人們都會將他們銘記於心的。

摹廬弟子周天游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寫定於西安南郊

注釋：

- 〔一〕《摹廬詩約·題發勤公金石拓本小冊》，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三十六頁。
- 〔二〕《摹廬詩約·保之從兄四十初度賦此致賀》，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十五頁。
- 〔三〕《漢書新證·自序》，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增訂版第四頁。
- 〔四〕《摹廬詩約》，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三十四頁。
- 〔五〕《摹廬詩約·題淮南半瓦拓本》，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二十九頁。
- 〔六〕《摹廬詩約·雜賦七首》，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三十三頁。
- 〔七〕《黃賓虹、王獻唐、郭沫若諸家致陳直論學書札九通》，載《文獻》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 〔八〕該書之《藏瓦小引》，載《關中秦漢陶錄》附錄，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下函。

目錄

關中秦漢陶錄第一集	陶器類	一
關中秦漢陶錄第二集	瓦當瓦片類上	二〇一
關中秦漢陶錄第二集	瓦當瓦片類下	三八七
關中秦漢陶錄第三集	磚文類	五一七
關中秦漢陶錄第四集	錢範類	五七一
關中秦漢陶錄補編		七一九
雲紋瓦圖錄		八四七
摹廬藏瓦附陳直先生其他藏瓦		九一七

閩中秦漢陶錄

第一集 陶器類

陳直撰

關中秦漢陶錄第一集目錄

鎮江陳直撰

漢建元四年陶尊	一〇
漢元平周子才陶釜	一一
漢竟寧元年陶甌	一一
漢建平陶甌	一四
王莽居攝二年陶尊	一六
秦井器陶蓋	一八
秦戲字陶洗	二二
漢咸里彩辰陶鼎蓋	二七
漢咸里簡奇陶尊	三九
漢咸里高昌陶鼎	四一
漢咸里閣咳陶片	四三